



把握好融合和差異的辯證關係

「一國兩制」實踐新階段

筆談

何建宗

2024年12月20日，在慶祝澳門回歸祖國25周年大會暨澳門特別行政區第六屆政府就職典禮上，國家主席習近平發表重要講話，高度肯定了「一國兩制」的成功實踐，深刻總結「一國兩制」實踐經驗，並表示「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是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的關鍵時期，「一國兩制」實踐也進入了新階段。」

2025年1月，中央港澳辦主任、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夏寶龍在學習貫徹習主席重要講話精神專題研討會上指出，要繼續推進「一國兩制」實踐行穩致遠，必須把握好四條規律性認識，其中第一條是要牢牢把握「堅守『一國』之本、善用『兩制』之利」的正確發展方向，他表示「一方面必須堅守『一國』，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高於一切，守護『一國』，落實中央全面管治權，任何時候都不能動搖。另一方面必須堅定『兩制』，尊重『兩制』差異，發揮『兩制』之利，充分保障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保持香港、澳門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長期不變，保持國際自由港和單獨關稅區地位長期不變，保持香港普通法和澳門歐陸法制度長期不變。」

如果要一組概念概括「一國兩制」這個史無前例國策的關鍵成功要素，回顧過去二十多年的實踐經驗，我認為是必須處理好「融合」與「差異」的辯證關係。事實上，融合的動力來自「兩制」的差異，沒有差異就沒有融合可言。理想的融合應該是優勢互補，壯大而不是削弱自身的基礎；如何在互相尊重差異的前提下，發揮各自的優勢，促進香港和國家共同發展，是「一國兩制」往前發展必須面對和解決的問題。

一、香港人從疑慮回歸到全方位與內地融合

我在香港土生土長，在天主教的教會學校讀中學和小學。在1980到1990年代，小孩子對祖國內地的印象就是比較落後，無論是在羅湖過關綿延不絕的長龍，晚上漆黑一片的街道，或者是內地同胞不一樣的服飾、文化和習慣，對於當年的香港人來說都是比較負面的事情。

實事求是的說，在上世紀80年代，不少香港人對於回歸是有疑慮的，主要擔憂兩方面：第一是私有財產會不會被沒收？第二是原來自由的生活方式會不會有改變？

當年國家正摸索着改革開放的前路，內地人民的自由程度跟現在完全無法比擬：當年無論是擇業，遷徙甚至結婚都沒有完全的自由。這也是為什麼基本法在居民的基本權利與義務一章當中，有第三十一條保障遷徙的自由，有第三十三條保障選擇職業的自由，有第三十七條保障婚姻與生育的自由。假如歷史重寫，假如基本法是在2000年後頒布，這幾條很可能就不會存在。值得注意的是，民主和普選的訴求當年在大部分香港人心中並不重要。

然而，隨着國家改革開放，國力逐步提升，過去二十多年，香港與內地的融合是全方位的。以下列舉一些人生不同階段的數據來描述香港與內地密不可分的關係。

家庭是社會的基本單位。而通婚可以說是兩地居民之間最深度的融合。在過去的十年間，香港與內地的跨境婚姻數量約佔香港註冊婚姻數量的三分之一。這意味着，香港和內地的文化和習慣互為影響是十分自然的事情。

在教育方面，香港擁有國際頂級院校資源，內地學生來港讀高等教育的熱度多年來只增不減，截至2023年底內地學生來香港就讀人數同比增長32%，超過6萬人，這批學生畢業後可以留港一年尋找工作，自入學起住滿7年可領取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證，而這些所謂「港漂」既整體提升了香港年輕人的素質，但也對本地年輕人構成激烈的競爭。

同時，內地廣闊的發展空間，優良的高等教育也吸引越來越多香港學生到內地升讀大學。自2012年推出「免試收生計劃」後，香港學生可以三種方式赴內地升學，據統計，在內地高校就讀的香港學生人數由2021/22學年的逾1.84萬名、2022/23學年的逾2.15萬名，增至2023/24學年的逾2.33萬名。兩地教育交流促進人才流通，為兩地在經濟與文化領域的合作創造更大的發展空間。

自2019年《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出台，香港與廣東省九市融合發展不斷加速，建設了前海、南沙、河套等重大合作平台建設。「硬聯通」日漸完善，2024年經港珠澳大橋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口的港澳旅客超1620萬人次。「軟聯通」加速推進，醫療、社保、專業資格互認等規則銜接不斷深化等等，帶動香港融入高水平對外開放等國家發展戰略大局。

其次，粵港澳大灣區建設讓兩地在民生領域的聯繫更加緊密，香港人大規模「北上消費」成為趨勢和潮流。據香港入境處數據顯示，2023年全年約有5300萬左右港人北上，相當於平均每位香港居民「北上」7.2次。2025年春節期間，WeChat Pay HK用戶北上消費筆數較去年同期增長約90%，其中餐飲、零售、繳費等內地服務場交易筆數增長超過一倍，內地個人小商戶交易增長更為顯著。

此外，香港居民往內地養老也越來越多，據香港特區政府統計處估算，約10萬名65歲或以上香港居民長期在廣東省生活。這些老人當中，既有需要在老人院被照顧的，也有已置業選擇回內地退休的。在香港「長者醫療券大灣區試點計劃」下，2021年至2023年，香港居民在港大深圳醫院申領的醫療券金額共3493.5萬港元，申請宗數10.68萬宗。內地養老已成為不少香港老人安養晚年的選擇。

香港居民過去二十多年已經以自身的行為說明，從結婚、生育、讀書、工作、移居到養老，兩地融合的廣度與深度是前所未有的。那些主張香港要與內地區隔的人，既是無知與傲慢，也是違背了主流的民意。

但在香港與內地經濟融合的大環境下，香港與內地在政治上仍然維持較大差異，即出現政治融合一條腿慢，經濟社會發展一條腿快的現象。「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過去在堅持「兩制」的同時，愛國主義教育出現缺失，「全面管治權」也沒有完全落實，「上層建築」未能適應兩地融合的事實，某程度也是導致2019年黑暴事件發生的深層次原因之一。隨着2020年香港國安法的頒布實施，不單止有效地防範、制止和懲治香港危害國家安全犯罪，也是在新形勢下堅持和完善「一國兩制」制度體系，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維護香港長治久安和長期繁榮穩定，對促進香港政治融合具有重要意義。

二、「兩制」之下的三大差異

在「一國兩制」下，內地與香港因為優勢互補促進了融合，但我們卻不能否認兩地客觀存在着各種差異。香港未來的發展要行穩致遠，不是要「消滅」兩地的差異，而是要把「兩制」之「異」化為「兩地」之「利」，即我們經常講的發揮「香港所長」貢獻「國家所需」。具體而言，我認為，內地和香港主要存在三種差異，兩地政府日後在制定各種政策的時候應該注意。

第一是制度差異。香港和內地在政治、經濟和法律制度的差異，是多年來融合的

重要基礎。這種差異使香港發揮國家與國際接合點的重要角色，也讓香港作為國家深化改革的試驗場。以證券市場為例，在1994年，首隻H股在香港上市，揭開了內地企業來港上市融資的序幕。來港上市的股票由國企、紅籌到內地民營企業，過去三十年的發展進程一方面協助內地企業集資壯大，也讓香港各行各業尤其專業服務業受惠。

制度差異的另一好處，是國家可以把部分改革專案在香港試行，累積經驗後逐步推廣。這種試點形式自內地改革開放以來，一直沿用。無論在股票市場、人民幣離岸市場、CEPA等等，過去二十多年中央政府一直利用香港作為一個可控的、與國家接軌的經濟體，與國際市場進行互動。

香港在這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功能。國家「十四五」規劃，明確了香港包括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在內的「八大中心」定位。在金融經濟方面，香港保持資本主義制度下，擁有與全球接軌的金融體系，對國際經濟市場有高度敏感性與適應性，在全球資本流動、資訊交流、技術合作等方面的引領作用。在法律等專業服務方面，香港在「一國兩制」下保持普通法制度，國際金融中心大部分都實行普通法，除了訴訟，仲裁和調解在「一帶一路」發展戰略當中可發揮更重要的角色。在內地企業「走出去」的過程中，面對複雜的國際商貿規則及法律環境，香港的法律專業人士可以為企業提供專業而多元化的服務。

第二是規模差異。內地與香港的制度差異造就了大量融合和發展的機會，然而，兩地規模的差異導致民眾之間的交往容易產生矛盾。過往「個人遊」帶來的內地遊客和相關爭議是最明顯的例子。當年來港內地遊客急升，主要原因是人民幣大幅升值；現在內地跨境電商發達，人民幣貶值而香港消費又高，導致來港遊客無論數量和消費額都出現減少。因此特區政府在制定政策時，必須考慮到兩地規模差異的因素。比如大灣區的融合，一方面措施不能完全對等：「港車北上」比「粵車南下」的步伐肯定要快一些；另一方面，也要考慮有序放寬鄰近城市（比如深圳）來港的便利度，有利兩地經濟社會的全方位融合。

第三是文化價值觀的差異。香港和內地由於不同的歷史發展進程，兩地的文化和價值觀有所差異是不爭的事實。但客觀地說，隨着過去四十多年國家改革開放、各方面和世界接軌，中國人對外地尤其西方社會了解大增，尤其是隨着兩地人民的

接觸越來越多，內地社交媒體在香港越來越受歡迎，這些差異正在縮小。

那麼，在「一國兩制」的新階段，我們應該怎麼應對這些差異和矛盾？我認為，「一國兩制」不只是促成港澳回歸的權宜之計，更是調和當今世上兩大制度：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制度的創舉。「一國兩制」是前所未有的，本身就是一個調和化解解矛盾的產物。我2017年創辦的智庫「一國兩制青年論壇」，正是回應這個時代的呼喚。智庫由內地年輕學者和香港年輕專業和跨界別人士組成，以「對話、橋樑、前瞻」為理念，就「一國兩制」的實踐和未來進行研究，讓兩地年輕人一同探索「一國兩制」的未來發展。

三、香港未來的必由之路：既「有異」於內地，也「有益」於國家

自香港回歸以來，「一國兩制」制度維護了香港高度自治權，在「一國兩制」制度下保持了香港長期的繁榮穩定，成為世界上最具競爭力的城市之一。經過近三十年的實踐，這一制度的巨大優勢和強大生命力，幫助香港渡過了亞洲金融危機、非典疫情、新冠疫情，曾在社會動盪時局下，堅守「一國兩制」，有效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讓香港從由亂到治走向由治及興。

在「一國兩制」實踐的新階段，香港既要堅守「一國」的核心原則，也持續發揮「兩制」所帶來的制度優勢，汲取成功的時代實踐經驗，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粵港澳大灣區作為國家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推動「一國兩制」事業發展的新實踐。新階段的香港必須充分發揮獨特作用，立足自身定位與優勢，促進香港進一步「融合」國家發展大局，縮減兩地「差異」，打造具有中國特色、國際一流的新时代「一國兩制」示範區。

總結而言，香港的制度既要「有異」於內地，更要「有益」於國家。過往的慘痛經歷香港人還是歷歷在目。香港基本法賦予特區民主制度的發展，最終達到普選；但過去反中亂港分子濫用香港的制度差異，圖謀藉「普選」脅迫中央，衝擊「全面管治權」甚至危害國家安全；基本法也前所未有賦予特區自行立法維護國家安全，也是同一批反中亂港分子濫用中央對特區的信任，多年阻撓立法，最後導致「港版顏色革命」在2019年上演。展望未來，只要我們更好把握好「一國兩制」融合與差異的辯證關係，真正做到香港制度既有異於內地也有益於國家，它就必然具有龐大的生命力，達到行穩致遠。

一國兩制青年論壇創辦人兼主席

內地民企發展得越好 香港獨特角色就越突出

新聞背後

梅若林

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在京出席民營企業座談會並發表重要講話，充分肯定民營經濟發展取得的重大成就和重要貢獻，並對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促進民營經濟高質量發展作了全面部署。座談會發出強烈信息，體現中央高度關心重視民營企業發展，說明民企大展身手正當其時。對於香港而言，內地民企發展得越好，香港的獨特角色作用也就越突出。香港各界要充分認識當前的形勢和機遇，不斷強化自身優勢，助力內地民企做大做強。在這個過程中，香港必能進一步實現產業轉型升級，迎來高質量發展新局面。

毋庸諱言，近年來由於國內外一些原因，部分民營企業在經營發展中面對各種各樣的壓力，更有人提出所謂的「民營經濟離場論」，稱民營經濟已經完成使命，要退出歷史舞台云云。此次座談會的舉行，既是對這類錯誤論調的有力駁斥，同時也是釋放出中央堅定不移支持民企發展的強烈信息。

推動民營經濟不能變不會變

第一，國家對民企發展的基本方針不會變也不能變。在2018年舉行的民營企業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已經強調，「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而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征程中，我國民營經濟只能壯大、不能弱化，不僅不能「離場」，而且要走向更加廣闊的舞台。」來到7年後的今日，習近平總書記更進一步指出「黨和國家對民營經濟發

展的基本方針政策，已經納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體系，將一以貫之堅持和落實，不能變，也不會變。」這番宣示，無疑為廣大民營企業家吃下「定心丸」，亦為實現民營經濟高質量發展注入強大信心和動力。

第二，中國民企發展前景廣闊、大有可為。截至2023年底，全國登記在冊經營主體達到1.84億戶，其中民營企業超5300萬戶，分別較2012年增長了2.3倍和3.9倍。這說明民營經濟在國家整體經濟中已形成巨大規模。近年來中國企業屢次取得全球矚目成就，例如比亞迪為首的電動車品牌，憑藉過硬的質量和性價比，在國際市場贏得全球消費者青睞；又例如DeepSeek-R1人工智能大模型，以遠超成本的高性能震驚全球創科業界，無不是新時代中國民企的實力表現。

接下來，中央將持續推進基礎設施競爭性領域向各類經營主體公平開放，落實各項紓困政策，強化執法監督，切實依法保護民營企業和民營企業家合法權益之下，廣大民企大顯身手正當其時。只要保持發展定力、增強發展信心，必定能夠克服眼中局部的困難和挑戰。

在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寄語廣大民營企業和民營企業家，為推進中國式現代化作出新的更大的貢獻。這無疑也是對香港社會和工商界的期盼，香港工商界要厚植家國情懷，堅定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建設者、中國式現代化的促進者。香港長久以來的成功，離不開愛國愛港的傳統。如今國家進一步深化改革開放，北部都會區、粵港澳大灣區、

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等新機遇，為香港提供了絕佳舞台。香港工商界也必須要在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過程中，乘改革之東風，發揮更大作用和作出更大貢獻。

助力內地民企走向世界

其次，要堅定不移走高質量發展之路，加強自主創新，轉變發展方式，不斷提高企業質量、效益和核心競爭力。推動香港經濟適度多元發展，不光關係着香港的國際競爭力，也與社會整體的健康發展息息相關。數十年來，香港仍未擺脫了過度依賴金融、地產等單一產業作為經濟主引擎的局面，不但令香港在現時全球的科技競爭中落後於人，亦對社會民生造成結構性影響。在國家堅定支持下，香港有基礎、有能力、也有空間推動創科產業發展。這是香港實現產業升級轉型的必經之途，工商界作為香港經濟發展的主力軍，更加要一馬當先，積極求變，開拓經營新方向，才能繼續維持香港「內聯外通」的獨特優勢。

香港是中國「引進來、走出去」的重要橋頭堡，現時國家大力支持民企發展，即意味着內地民企將更有需要和迫切性開拓國際市場，這正是香港可以發揮最大作用的地方。作為國家的「超級聯繫人」和「超級增值人」，香港要認清自身優勢，加快推動與內地之間的機制對接，並且積極推動與新興市場的合作，發揮好連接內地與國際的橋樑角色，在助力內地民企走向世界的同時，實現自身更好發展。

議論風生

曉斌

人工智能等創科發展迅速，DeepSeek等不斷刷新世人認知。在

創新科技的發展競賽中，香港要想脫穎而出，需要有的放矢政策，尤其要有效提升科研成果轉化比例。事實上，香港此方面一直落後於深圳等城市。當然，提升科研成果轉化比率是一個系統工程，不可能今日投入、明天見效，但不能無動於衷，需要有的長遠規劃，尤其要從制度創新、資源整合、市場導向等多方面發力，以構建完整的創科生態鏈。

完善科研成果轉化機制。科研成果轉化的第一責任方是高校，但現行香港各高校內的技術轉移辦公室（TTO）成效欠佳，專利申請和商業化流程繁瑣。科研人員激勵機制不足，現行制度下科研人員僅能獲得技術轉讓收益的30%-50%，低於國際普遍水平，早前有大學大幅提升至70%，這是一個很好的做法。同時，應將科研成果轉化指標納入大學評估體系，例如佔比不低於30%，並設立科研成果轉化專項基金，重點支持具有市場潛力的應用研究項目；簡化專利申請流程，將審批時間壓縮至6個月以內。提高科研人員收益分成比例，激發科研人員參與成果轉化的積極性。

加強產學研協同創新。2024年，香港企業研發投入僅佔GDP的0.4%，遠低於深圳的4.2%。大學與企業合作項目數量有限，且多集中在傳統領域，缺乏前沿技術突破。如何提升投入比，是一個重要且迫切的課題，而構建高效的產學研合作平台勢在必行，建議設立大灣區產學研創新聯盟，整合區域創新資源，建立產業需求導向的科研項目立項機制，確保科研方向與市場需求精準對接。同時推動建立開放式創新體系。鼓勵企業設立聯合實驗

室，與大學開展深度合作。建立科研成果共享平台，促進技術交流與協同創新。

優化創科生態系統。香港創科生態圈的風險投資規模有限，數據顯示2024年僅為新加坡的三分之一。科技中介服務機構數量不足，專業化程度有待提升。產業配套設施不完善，制約科研成果產業化進程。因此，完善科技金融支持體系至關重要。建議設立科研成果轉化風險補償基金，鼓勵設立專注於早期項目的風險投資基金，完善創科企業融資渠道；引進國際知名技術轉移機構，提升本地服務水平。建立技術經紀人認證制度，培養專業化技術轉移人才隊伍；加強產業配套設施建設。規劃建設專業化科技產業園區，提供中試基地和產業化空間。完善法律、會計等專業服務配套，降低科研成果轉化成本。

今年1月9日，夏寶龍主任在學習貫徹習主席重要講話精神專題研討會上指出，香港要「大力發展創科科技產業」。行政長官李家超帶領新一屆特區政府積極作為，推出了大量推動創科發展的政策，成效初現。但創科發展競爭激烈，不進則退，香港必須及早從制度機制上作出突破，為日後的快速發展作好基礎。

提升科研成果轉化比率是一項系統工程，需要政府、大學、企業多方協同發力。通過完善轉化機制、加強產學研合作、優化創科生態，香港有望在未來五年內將科研成果轉化率提升至50%以上。這不僅將釋放香港強大的科研潛力，更將推動創科產業成為經濟增長新引擎，鞏固香港國際創新中心的戰略地位。在國家創新驅動發展戰略背景下，香港科研成果轉化能力的提升，將為大灣區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建設作出重要貢獻。

有效提升香港科研成果轉化率